

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影响因素研究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ft Constraints on Enterprise Budget

车彦波

Yanbo Che

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集团 中国·陕西 榆林 719315

National Energy Group Shendong Coal Group, Yulin, Shaanxi, 719315, China

摘要: 本文选择以 2000—2009 年作为时间窗口期,通过提出多个不同的假设并选择多种模型对影响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抵御预算软约束;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及市场化发展程度越好则表明该地区的预企业预算软约束情况严重。基于企业的角度而言,不仅对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带来的恶化,还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民营企业的预算约束得到了强化。另外,产权改革以及市场化发展促进了企业预算约束的强化。因此,本文认为降低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促进市场化发展及产权改革、降低政策负担以及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都是克服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重要手段。

Abstract: this paper chooses 2000—2009 as the time window period, through putting forward many different assumptions and selecting various model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ft constraints on enterprise budg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an help enterprises to resist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better, and the better the economic growth target and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local the more serious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of pre-enterprise in this area.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nterprises, not only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budget soft contrac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ut also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budget constraint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o a great extent. In addition, property rights reform and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strengthening of enterprise budget constrai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holds that reducing the economic growth target of local government, promoting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property right reform, reducing the policy burden and increasing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are all important means to overcome the soft constraints of enterprise budget.

关键词: 预算软约束;经济增长目标;市场化程度;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干预

Key words: budget soft constraint; economic growth target;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DOI: 10.36012/emr.v2i5.2557

1 引言

预算软约束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企业一些微观行为及资源配置情况,并且逐渐被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所关注和重视。一时之间,形成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原因有哪

些?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如何克服企业预算软约束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专家们的研究重点。有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内部的公有制结构造就了“预算软约束”。但是也有些专家认为:前后期的投资时间存在差异,这是形成

【作者简介】车彦波(1981—),女,辽宁省朝阳市人,中级会计师,从事会计方面研究。

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主要来源,并提出预算软约束是企业的一种内生现象。林毅夫认为企业如按预算的出现是因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较重,但是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是毫无关联的。由于不同的观点对于如何预算软约束的建议也不尽相同,因此针对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影响因素展开详细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政府干预

近年来,财政分权改革进程一直在不断地深入,促进了贷款分配政策的顺利实施,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地方政府对财政的控制权,这样的发展形势与地方的经济发展战略出现严重的冲突。但是政府通过对银行经理任命以及市场准入门槛的控制来不断地强化对银行利率及服务定价的管控,以此来实现政府对企业或者行业的财政支持,基于这样的情况下银行为政府利益提供服务是必然选择。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一旦商业银行因贷款而发生问题时,政府有义务对银行的行为负责和提供帮助,从而也导致对银行预算的软约束情况^[1]。另外,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管理者都与政府部门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甚至有些政府官员直接担任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有此可知,国有企业管理者为政府官员提供服务是非常正常的。

辛清泉认为上述的种种现象可以将其总结为:政府、国有企业、商业银行的多重预算软约束。究其本质,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目标为依据,干预企业经营从而引发投资过度现象的发生,从而造成国有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也是因为政府的干预致使商业银行不断地向国有企业放贷,长期处于这样环境下一旦企业投资失败,必然会波及到政府和银行,而政府则会为挽救此现象而选择向商业银行求助。林毅夫认为:政府的政策性负担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企业破产也会受到政府的干预,国家需要对任何企业负责。同时其还认为预算软约束的硬化与否与政策性负担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种假设:

假设 1:政府干预越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越严重。

假设 2:国有企业你能够软化企业预算约束。

2.2 企业自身能力、政策性负担及市场化发展

在完全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如果不存在外部干预,企业在正常经营期间不会出现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利润率,则表明该企业的自身能力较强,反之则较差;但是随时市场化改革脚步的不断加快,导致各种生产要素及产品价值的决定开始取决于市场竞争情况,这样一来资本密集型企业则会因缺乏自身能力而慢慢不再盈利,从而加重了企业的战略性

政策负担。任何一种政策性负担都会导致企业的成本增加,还会影响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同时这些政策性负担还会致使企业发展出现亏损的现象,削弱企业自身能力。在克服预算软约束的过程中消除企业政策性负担是非常必要的,其核心就是提高企业的 TFP。以模拟软约束企业 TFP 提升的过程中发现,软约束可以增加企业的资本及产出,但是因挤出效应的存在导致硬约束下企业的资本及产出大幅度减少,但社会总产出得到了提升,换言之,软约束下的 TFP 提升可以在提高企业自生能力的同时提高社会总产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市场化竞争加强了企业预算软约束。

假设 4:政策性负担会加剧企业预算软约束。

假设 5:TFP 的提升是克服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重要手段。

3 变量定义与数据描述

3.1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借助了林毅夫提出的:“利息支出占债务比重×100”以此来反映企业预算的软约束情况。

(2)解释变量包括以下几种:①全要素生产率(TFP)其是衡量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②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增长目标越大表明干预动机越强,而对企业造成的影响越大;③政策性负担可以分为战略性政策负担与社会性政策负担两种;④市场化指数,就是市场化转型的一个相对进程,能够将制度变量进行量化。

(3)控制变量包括:债务结构、清算比例、生存年龄以及企业规模等。债务结构是企业年末流动负债在总负债中所能够控制的偏差;清算比例是通过企业固定资产总额在总资产中的比重进行衡量的,能够合理地控制这一偏差;生存年龄指的是效率越高的企业规模越大,其生存能力则越强;企业规模可以通过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进行表示^[2]。

3.2 数据描述

本文选择了 2000—2009 年作为时间窗口期,基于部分数据删除的基础上,对数据的两端展开了 1% 的缩尾处理,并从中获取了 1168373 个样本。

4 实证分析

4.1 不包括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及国有比例的其他因素对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影响

本文针对不包括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及国有比例的其他因素对企业预算软约束影响所构建的模型如下:

$$IDR_{it} = \beta_1 TFP_{it} + \beta_2 CICI_{it} + \beta_3 market_{it} + \beta_4 lhi_{it} + \beta_5 scr_{it} + \beta_6 age_{it} + \beta_7 size_{it} + \beta_8 Tang_{it} + u_i + \epsilon_{it}$$

公式 μ_i 中表示个体异质性, ϵ_{it} 表示随着个体及时间而改变的干扰项。

通过上述模型分析结果可知,当 TFP 系数为正数是表明企业 TFP 的提升可以克服预算软约束。主要是因为 TFP 的提升可以促进企业盈利能力增加,同时企业自生能力也得到了增强,实现了克服预算软约束的目标。政策性负担系数为负数是表明企业可以软化预算约束,并且同企业本身的性质无关联,这也与林毅夫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4.2 不包括市场化指数的其他因素对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影响

针对不包括市场化指数的其他因素对企业预算软约束影响的模型构建如下:

$$IDR_{it} = \beta_1 TFP_{it} + \beta_2 GDP_{it} + \beta_3 CICI_{it} + \beta_4 ratio_{it} + \beta_5 hhi_{it} + \beta_6 cr_{it} + \beta_7 age_{it} + \beta_8 size_{it} + \beta_9 Tang_{it} + u_i + \epsilon_{it}$$

通过模型分析可知,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系数中除固定效应民营企业为正数,其余均为呈现负数,意味着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的目标越高,政府的干预动机越强,在国有企业中的表现越严重。也就是当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在事前干预了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就需要在投资失败后对企业做出救援行为。TFP 系数为正,而政策性负担的系数为负表明企业的债务结构、清算比例、生存年龄以及企业规模系数具备显著性,表示回归结果具备极强的稳健性。

4.3 综合效应

为了更进一步验证综合效应,则构建如下模型:

$$IDR_{it} = \beta_1 TFP_{it} + \beta_2 GDP_{it} + \beta_3 CICI_{it} + \beta_4 market_{it} + \beta_5 hhi_{it} + \beta_6 ratio_{it} + \beta_7 cr_{it} + \beta_8 age_{it} + \beta_9 size_{it} + \beta_{10} Tang_{it} \times market_{it} + \beta_{11} GDP_{it} \times market_{it} + u_i + \epsilon_{it}$$

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TFP 的系数为显著正,代表着不同模型及不同方式所得到了系数均为显著正,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意味着 TFP 的结果较为稳健。而政策性负担、市场化指数、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系数均为显著负,结果也未发生改变,同样具备稳定性^[3]。企业的生存年龄、企业规模、负债

结构以及清算比例系数呈现出现显著性,表明回归结果十分稳健。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实证研究可知,政策性负担能够直接对企业造成预算软约束,而 TFP 的显著提升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克服预算软约束现状。地方政策经济增长目标越高意味着对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程度越强;市场化程度的提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情况,但是就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言,短期的市场化发展不仅能够恶化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同时也硬化了民营企业的预算约束情况;基于长期角度而言,市场化发展及产权改革能够推动并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同时,民营企业的发展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更具竞争力。

5.2 建议

(1)由于地方政府及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变化能够导致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因此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基于政府预算软约束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特点变化进行研究。

(2)可以通过构建委托代理模式的方式来进一步研究企业的发展过程,并明确多个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对企业预算软约束带来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 [1] 孔繁成,易小琦. 预算软约束与企业“僵尸化”: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产业经济评论(山东),2019(2):60-78.
- [2] 倪志良,高正斌,张开志. 政策性负担与国有企业杠杆率:预算软约束的中介效应[J]. 产经评论,2019,010(003):102-114.
- [3] 方森华,李朝辉,欧远帆. 预算软约束,货币政策与去杠杆路径分析—以 DSGE 模型研究为视角[J]. 区域金融研究,2019,000(002):32-37.